

■ 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两浙”

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 黄 健 著



浙江
大学
出版
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两浙”

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 黄 健 著


浙江
大学
出版
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 黄健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308-05873-5

I. 两… II. 黄… III. 文学研究—浙江省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393 号

“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黄 健 著

责任编辑 钟仲南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1,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327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873-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导 论 “两浙”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内在关联·····	1
第一章 “两浙”文化审美意识与中国新文学的生成·····	15
第一节 文化基因：“两浙”文化审美意识的萌生·····	16
第二节 文化交汇：“两浙”文化审美意识的衍变·····	26
第三节 文化动力：“两浙”文化审美意识的转化·····	49
第二章 “两浙”文化资源对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支持·····	56
第一节 “浙东学派”的思想影响与精神传承·····	58
第二节 明清社会思潮与文学变革的波及效应·····	71
第三节 “浙江潮”的涌动与文化碰撞的觉醒·····	84
第三章 “两浙”作家的文化体认与新文学的基本走向·····	92
第一节 海外留学、翻译活动与文学新思维·····	93
第二节 “两浙”作家对新文学现代性的建构·····	108
第三节 “两浙”作家对新文学基本范式的奠定·····	128
第四章 “两浙”作家的价值取向与新文学的主题路径·····	158
第一节 进化论价值取向与“人”的主题·····	159
第二节 个体性价值取向与“自我”主题·····	173
第三节 主体性价值取向与“反抗”主题·····	187

第五章 “两浙”作家的文化性格与新文学的美学风貌 ·····	207
第一节 浙东“刚性”文化与新文学的坚韧风格·····	209
第二节 浙西“柔性”文化与新文学的柔婉风格·····	238
第三节 “两浙”作家的美学理想与诗性审美品格·····	262
第六章 “两浙”作家的审美观照与新文学的书写谱系 ·····	268
第一节 “两浙”作家的意识聚焦与思想张力·····	269
第二节 “两浙”作家的乡村记忆与乡村书写·····	278
第三节 “两浙”作家的都市意识与都市想象·····	288
第七章 “两浙”作家的艺术创新与新文学的文体变革 ·····	299
第一节 前卫姿态与新文体的革新理念·····	300
第二节 主体维度与新文体的叙述风范·····	312
第三节 语境规约与新文体的语言策略·····	322
第八章 “两浙”作家的创作实践与新文学的思潮流派 ·····	331
第一节 文学思潮的引进与探索·····	332
第二节 文学社团的中坚与担纲·····	342
第三节 文学流派的主导与引领·····	350
余 论 新文学的先锋特质与“两浙”作家的先锋性 ·····	361
后 记 ·····	369

■ 导 论

“两浙”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内在关联

在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中,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或称“区域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不仅仅是指文学是否存在地域性的问题,而是涉及在整体文化出现“意义危机”时,作为原型的地域文化将如何孕育和催生新文化、新文学生成的问题。不可否认,文学是存在地域性的,它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而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瓌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归因于“楚人之多才”。^①然而,地域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与文学发生联系,影响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爱好和艺术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使文学烙上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特别是就中

^① 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中外学者对地域文化(区域文化)影响文学的现象都作过专门研究,如孔颖达的《十三经注疏》就南北地域文化对人的性格生成产生影响作过精细的评述:“北方沙漠之地,其地之阴,阴气坚急,故人则猛,恒好斗争”,而“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出:“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论述法国和意大利民族文化性格特点时指出,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而意大利民族则是“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诉之于感觉的形式,就是音乐和绘画”。由此可见,特定的地域(区域),特定的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国新文学的生成而言,地域文化——“两浙”文化^①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国新文学?这需要从文化原型、文化基因、文化审美意识的生成、转化、孕育和影响角度,加以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从中找到“两浙”文化与新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

无论是从文学的地域性文化特征,还是从作家与地域文化关系上来看,地域文化都是作为母文化原型在发挥着它的作用的。所谓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一般是指孕育一种文化生成的母文化元素,而地域文化往往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不同于人文地理中的“文化地理学(Geo-cultureless)”,地域文化主要是探讨和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的区域性人文发展规律和表现特征的。具体地说,地域文化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从中展开对不同地域的文化进行历史演变与发展规律的探讨。其中所提到的“地域”或“区域”(Region)的概念,多半是古代沿袭或者约定俗成的历史区域。这种地域概念在形成当初或许是精确的、清晰的,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它的地理概念已逐渐模糊,而文化上的意义则依然留存,并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开始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和制约着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原型批评家弗莱认为,“原型”原是

^① “两浙”是历史地理概念,大致指的是以钱塘江为界,将现在的浙江省和江苏、上海的部分地区称为“两浙”地区。一般而言,钱塘江以南的地区,即今天的绍兴、宁波、台州、温州、丽水、金华、衢州等地区,通称“浙东”地区,而钱塘江以北的地区,即今天的杭州、湖州、嘉兴、江苏南部(含上海),亦即太湖流域,通称“浙西”地区。“两浙”的来源最早见于唐朝记载的“两浙道”,元代正式建制“两浙省”。从地域文化角度来讲,“两浙”属吴越文化区域。因此,以历史的维度而言,“两浙”文化亦可以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吴越文化,但主要是指设置“两浙道”之后的吴越文化;以地域的维度而言,由于主要是针对北方文化而言,“两浙”文化又可以被称之为江南文化。相比较而言,“浙东”属越文化区域,文化性格偏刚性;“浙西”属吴文化区域,文化性格偏柔性。为行文的方便,本书在论述不同对象时,将“两浙文化”、“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含义打通互用,并不作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文化意象,但这些意象却具有孕育与影响母文化的功能。它不仅显示出文化构成的全部细节,同时还将深深地映在人们的脑海里,成为一种信息模式,潜移默化地制约着人的思想与言行。^①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②。地域文化原型多半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在特定区域的文化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与制约着该区域人的思维、认知、心理和性格的生成与发展。

在近代中国爆发的中西文化冲突当中,以内陆性农业文明为属性的中国文化,遭遇了来自以海洋性商业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为属性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两种文化冲突的直接结果,乃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与终极意义的整体危机。面对痛苦的文化失落,“先进的中国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将审视传统文化和建构新文化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如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口号,第二代“先进的中国人”则更是直接从西方文化中搬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从近代西方文化当中汲取中国文化不曾有的文化质料和文明因子,建构如鲁迅所期待的“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③。因此,在近现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文化的转型,就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文化语境。在这当中,当传统文化出现整体性意义危机,不足以支持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之精神世界时,地域文化作为整体文化的内部要素,反倒显得格外的活跃。

① 原型批评主要源自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后被加拿大著名的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弗莱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正式提出了“文学原型”学说。弗莱主要是通过对话模式、传奇模式和写实模式的研究,对文学的转换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此,本书运用该理论对“两浙”文化和新文学生成、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是要通过对地域文化作为母文化孕育和转换功能的发掘,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规律特征。

②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朱立元等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③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

希尔斯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内含着接受变化的潜力,并促发人们去改变它。某些传统变迁是内在的,就是说,这些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加以改变的。这样一种变迁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①文化变革和文化转型,外部影响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获得文化内部因素的对应,实际上也是很难导致文化系统发生根本性质变化的。一般来说,在整体文化出现失落而产生变革时,文化内部最具潜力和最活跃的文化因素,地域文化算是其中的一个。^②作为文化原型,地域文化以保存整体文化单个或多个文明因子的方式,为整体文化的转换,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支持,并同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人们提供特定的文化慰藉和文化对应方式。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想象、知觉和思维都被一些先天的、普遍存在的形式因素所影响”^③。地域文化在近现代中国发生急遽变化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对应外来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心理机制和母文化元素。

作为地域文化的“两浙”文化,在文化构成的原型要素上,具有“博纳兼容”、“经世致用”、“刚柔并济”和“开拓创新”等特点。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文化圈内,相对中原中心地带而言,地处边缘的“两浙”地区(尤其是浙东地区),背靠内陆,面向大海,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生存环境比较恶劣(这方面有点类似希腊文化生成的情景)。无论是在基本的生存方面,还是在文化的生成方面,它都需要有一种向内求生存的忧患意识、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和开拓进取的运行机制,以接收来自中心地域文化的辐射,为生存开拓新的疆域,其中包括精神疆域,以使自身成为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登陆点和接纳点。

① 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页。

②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各省的留学生就纷纷以自身地域名来命名所创办的刊物,如浙江的《浙江潮》、湖南的《新湖南》、河南的《河南》、湖北的《湖北学生界》等。这都可说明地域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影响力。

③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6页。

“两浙”区域发展史表明,东汉以后,“两浙”接受中心区域的各种辐射就开始大大加强了。隋唐之后,表现则更为突出。^①“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即是唐宋之后整个江南吴越之地繁荣盛况的写照。“两浙”地域文化的每一次碰撞与整合,非但没有被同化或解体,反而不断增强了自身的凝聚力和调适力,推动了自身文化的不断增殖。毋庸置疑,“两浙”文化这种比中心文化更为鲜明的生存忧患和开放进取的特质,对其文化个性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生活在该区域的人的文化性格、心理素质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书·地理志》中称:“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高帝记》又称:“越人之俗,好相攻击。”这些习性的生成和后续的变化发展,应与“两浙”文化的刚柔相兼济,沉郁而激越,自由而活跃,越人的耻为人后、精明强干、开拓进取等性格特征都有密切的关系。

地域文化在给予该区域人们的精神关怀方面也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支撑和稳定该区域人的心理和整合区域社会的精神支柱,以及该区域人民创造自身历史、丰富整体文化的精神动力。蔡元培在《越中先贤祠春秋祭文》中曾这样赞美越文化:“经论云雷,实维大禹。服教畏神,礼义之府。后王尝胆,任侠竞翹。……儒林大师,余姚肇祖。千祀不祧,授经图谱。新昌朴学,翼左程朱。良知证人,大启堂庑。文苑之英,盛哉典武。”^②从文化生成的原型角度上来看,这种不断演化和积淀而呈开放进取性的“两浙”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深深地影响着该地域的人的思想观念、认知方式和心理感悟方式。诚如荣格所说:“集体无意识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在的实体;它仅仅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以特殊形式的记忆表象,从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或者以大脑的解剖学上的结构遗传给我们。”^③

“两浙”地域文化开放进取的文化原型,在深层的意义上,可以说,

① 参见滕复、徐吉军:《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页。

③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0页。

是一种建构开放理念空间的文化场，一种耻为人后的忧患意识和心理认知方式，一种不断向外开拓进取的精神巢穴。文化发展史证明，当中心文化出现意义的整体危机和失落时，地域文化由于中心文化被解体，反而获得了空间的释放，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成为人们深层记忆当中可以被回忆、被感知、被藉慰和被激活的文化因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由意义的整体危机、失落而呈转型之势。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时期，原先被整合在中心文化的“两浙”地域文化，就成了当时最活跃的文化因子之一，成为特定时期失去整体终极关怀的人的精神藉慰和文化依托之一，同时，它又以保留中心文化元素的角色，为中心文化的整合、复兴，提供“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质料。因此，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时期，从“两浙”文化圈内走出来的文化人，往往能够以一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震荡，并为整个新文学推出阵容强大的作家群，谱写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

二

荣格在论述作为原型的“集体无意识”特点时指出：“这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它仿佛来自人类史前时代的深渊，又仿佛来自光明与黑暗对照的超人世界。这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原始经验……这种经验的价值和力量来自它的无限强大。它从永恒的深渊中崛起，显得陌生、阴冷、多面、超凡、怪异。它是永恒的混沌中一个奇特的样本。”^①从文化生成上来说，整体文化的生成是多种地域文化的有机聚合与相容。从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说，文化原型的影响最为深远。地域文化作为文化原型，无论是对整体文化生成而言，还是对个体成长而言，都具有一种“无限强大”的超人力量。这种力量的直接显现，就是它的母文化影响功能。

^①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第129页。

由于原型文化具有强劲的继承性和传播性,它往往能够在特定的时期使人的内在禀赋得以充分的显现,发挥出特殊的作用,诚如荣格所说:“心灵的每一次外在显现都同时混合着多种影响。首先是清醒的自我(the conscion ego)的影响;其次是个人以及个人所从属的群体身上那些很少被意识到的情结的影响;再次就是来自未被意识到的集体心理的那些无论以什么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原型动力机制的影响。”^①在近现代文化转型之际,“两浙”文化作为母文化的影响功能,具体表现在对人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感悟方式,以及审美理想的选择上。它使从“两浙”区域走出来的文化人,能够在新旧转换当中脱颖而出,以其天生的敏感性、敏锐性和开拓性,走向时代的前列。公猛曾激情澎湃地写道:“乃读乡先贤哲学士大夫之遗书,其理想之高超,出乎天,天而入于人,人发为章,云蒸霞蔚,光怪陆离,我浙人以干政治界、哲理界、文艺界,其位置固何等乎?……且将挟其一切哲理、一切艺术,乘此滚滚汨汨飞沙走石二十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射相交换相融合,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以灌溉我二十一行省之同胞,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其果能担任此言乎,抑将力不能胜任,徒为历史羞乎?”^②滔滔之雄词,滚滚之激情,其中就裹挟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就像“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③那样,“两浙”地域文化基因,在特定时期起到了特定的作用,让“两浙”人在文化转型的特定时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浙江潮》当时刊登的大量文章,就其反清排满、救国救民的出发点而言,便都是基于“两浙”文化的审视眼光来进行旁证博论,深化而行的。像匪石的《浙风篇》,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公猛的《浙江文明之概观》等,都是带着地域文化的审视眼光来综论整个世界、整个中国之形势的,这足以表现出“两浙”文化人宽广的文化视野。

① 荣格:《荣格性格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 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1902年第1期。

③ 蒋百里:《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1902年第1期。

在文学方面，“两浙”地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浙”作家^①在以艺术审美方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独特文化视角上。以鲁迅为例，在“逃异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之后，对现实异化的高度关注，对“立人”终极关怀的构筑，从而引发他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境况、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于是，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现实异化对人的压迫，展现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就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的独特文化视角。基于“立人”思想，鲁迅总是善于将现实异化与历史异化联系在一起，用他那特有的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的刻骨铭心的感悟和深刻认识，完整地构筑了他笔下所展示的“国民性世界”，并以超越于有限历史之上的心理透视，在最广泛的人生意义探寻上，通过对国民性的剖析，构筑了有关人的生存、发展和命运的诸多精神命题。鲁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中，完成对国民、对民族，乃至对整个人类精神的深刻探索和思想启蒙。鲁迅在《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祝福》、《阿Q正传》、《明天》等一些小说中所展现的民族生存主题，透视了落后民族在新兴文明冲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愚昧、麻木和无知的心理，深刻描绘出了整个民族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必须变革旧的生活方式、旧的生存方式所产生的内心恐惧和苦痛状态。鲁迅在小说中，展现了两种文明冲突在旧式的家庭（族）里所引起的极度的孤独和恐惧，揭示出潜藏在喧嚣而混乱背后的是愚昧麻木的国民“永远的不理解”，甚至是永远的无法拯救的存在境况。鲁迅更多地展现了国民在精神上的愚昧状态，揭示出了“老中国子民”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困境，其广谱意义在于揭示一个在长期封闭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农耕文明，其实并没有为容纳一种新的、陌生的文明而作好从容准备的心理与文化根源。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仍然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习惯成自

^① 本着探讨“两浙”文化与中国新文学内在关联的宗旨，本书所指的“两浙”作家，主要是指狭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浙”作家，不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两浙”作家，也不包括1949年以后，俗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两浙”作家。同时，考虑到从民国到今天的地方建制情况，本书所论及的“两浙”作家，主要还是指由现在的浙江省管辖地区的“两浙”作家（浙江籍作家），不包括现在由江苏省、上海市管辖地区的作家。

然的文化心理性格。在近代中国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冲击之中,国民也就显得更加无奈、张皇。新旧文化的强烈对立和冲突,使得绝大多数国民的愚昧麻木更显沉重和落后。这是人与社会、历史和文化在国民心中存留的永恒矛盾。如若回避这种矛盾,无疑会像阿Q那样,最终还是在战战兢兢中无声无息地消亡,被世界所“挤出”,被现代文明所淘汰。应该说,这也正是鲁迅最为关心、关注的社会变革的内容。

鲁迅始终是将火一样的激情裹挟在冰一样的冷静之中,从而写出了一个民族、一块大陆的整体惶惑,整体对现代文明的不适应性。尽管他的小说并非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或历史真相的再现,但他对于历史的评判,对于现实异化的揭示,则深刻地阐释出了对于一个民族、一块大陆,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历史、精神心理及命运的寓言意义:“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这沉重的呐喊声,在历史与现实的空谷里长久地回荡,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作为新文学的基本主题意向,关联着现代中国文化泛文本中最基本的语义内容。从文学特性上来说,鲁迅沿着“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思路进行创作,为新文学首创了五种人物形象:(1)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如狂人;(2)封建道统的维护者形象,如赵太爷;(3)被封建势力绞杀的革命者形象,如夏瑜;(4)愚昧的民众形象,如阿Q;(5)无辜的受害者形象,如狂人的妹妹。对这五种人物形象的塑造,鲁迅在小说创作中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启蒙意义的象征世界。在冷静的叙事中,鲁迅把对国民性的分析,对民族生存状况的揭示,以及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民族命运的阐释,都烙上了鲜明的思想启蒙的印记,使之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涵义。鲁迅对整个民族心理、性格结构、历史沿革、文化风范的深切体察和内心感悟,也使他的小说在叙事层面上,一开始就超出了有限的表层叙事的意义范畴,而兼具叙事与象喻(象征喻义)的双重功能,即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心理揭示,传达出整个民族在动荡的文化和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内在苦痛和心灵律动,并包孕着对千百年历史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在民族心理中所产生的积淀及后果的细腻分析和反省,同时,这种主题思路也成为鲁

迅借以探寻和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意识和心理性格的一种独特方式。民族的生存境况、国民的愚昧精神状态、国民的奴性心理性格，乃至人的解放、个性解放、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蕴含在这个主题思路之中。所以，沈雁冰（茅盾）说读鲁迅的作品“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绝的阳光”^①。沈雁冰还指出：“在他（指鲁迅）的著作里，也没有‘人生无常’的叹息，也没有暮年的暂得宁静的歆羨与自慰（像许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尽自刺。”^②沈雁冰的见地是十分深刻、独到的。应该承认，鲁迅开辟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思路，在整个新文化、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显然，鲁迅这种独特的文化视角，直接生成因素就与作为原型的“两浙”地域文化有关。蒋梦麟在以“绍兴师爷”为例论述绍兴文化的特征时指出，“熟谙法令律例”、“追求事实”、“辨别是非”等，使绍兴及浙江人“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他甚至认为，这种“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③当然，原型归原型，原型并非决定一切，但它提供的认知视角和独特的心理感悟，则能够在特定的情形中，使人从中产生“大量特殊的、已被人们知道的可以交际的联想结构”，为“处在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熟悉它们”^④。从地域文化与鲁迅的关系，到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我们可以探寻到地域文化与整个新文学生成的关联性脉络。^⑤

① 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1923年10月8日第91期。

② 沈雁冰：《鲁迅论》，《小说月报》1927年11月第18卷第11期。

③ 蒋梦麟：《新潮》，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12页。

④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朱立元等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⑤ 参见黄健：《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三

作为母文化的地域文化,其原型还具有无限生成的转换性特征。借用生物遗传学的术语来说,母文化原型具有“转基因”的功能。^①弗莱在提出“文学循环”的观点时指出:“文明社会的生命常常等同于有机物的循环过程:生长,成熟,衰落,死亡,以及另一个体形式的再生。”在他看来,原型基因是“可以转换的”,是“从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的“转换运动”。按照他的观点,文学的发展也就是原型的“转基因”运动。^②

“两浙”地域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两浙”作家提供了一种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独特的文化感知方式,使之获得了文化转基因的内在催化动力。从中国新文学生成的特点来看,“两浙”作家群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内源性的基因转换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③以《浙江潮》和东京“Z”会馆为标志,“两浙”地区的留学生群体是最先获得自身独特的文化感知的群体。鲁迅在谈《域外小说集》的编撰时曾说:“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涖与,而性解思维,实寓于此。”^④弃医从文,办《新生》,翻译域外小说,对周氏兄弟,以及对整个“两浙”文化人而言,都表明他们对“新潮”具有独特的文化感知和文化反应。因为从心理对应机制上说,如果没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原型的对应,也就很难作出这种文化上的

^① 中国旅美作家严歌苓在谈到自己为什么选择写作时,曾形象地说:“基因,基因决定了自己的身份。”参见 http://www.zaobao.com/gj/zg060704_505.html

^② 参见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彭晓丰、舒建华以鲁迅对施蒂纳、阿尔志跋绥夫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赞赏,并接受其影响为例,认为他们之间共同拥有一种“无形的精神空间”,进而获得主体的“内源性”自觉。参见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④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感知、反应和选择。深究“两浙”文化人的内源性因素，可以说其文化基因具有一种转换的功能。以学术为例，如果说学术是知识群体对来自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实践的理论思考、提升和总结，那么，“两浙”学术（特别是“浙东学派”的学术）在这个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博采众长、整合创新。它体现了“两浙”知识群体，对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所作的认真审视和理性思考。

在“两浙”学术史上，最初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移植型”的文化特征。如在汉唐时期，“两浙”文化人就善于将中原文化移植过来，补充、充实和发展地域文化。其中，王充的学术就广泛吸收了先秦以来各家的思想而自成一家之学说；又如南宋以来，大量的北方文化人来“两浙”定居，这也使“两浙”地域文化获得了大融合的机遇，“两浙”学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大学派^①；明代形成的“浙东学派”也极具特色和影响。“两浙”学术的这种特点，是“两浙”文化的内源性具备转基因功能的典型表现。当它成为整个地域文化的一个基因特征时，就能够为置身于变革激流中的“两浙”文化人提供接受外来影响，促进自身变革的内源性要素，使之走在时代的前列，正如黄宗羲所称赞的那样：“会众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达于海”^②。

从“两浙”地域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生成的关联上来探讨，地域文化原型的转基因作用，仅从新文学的范式生成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认证。拉里·劳丹在论述范式内涵时指出：“范式是‘考察世界的方式’，是有关某些领域的现象应该如何解释的普遍的形而上学的洞见或预感。”^③ 范式包含着深刻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意义的结构模态，每一种文学观念都凝聚在其范式结构当中。文学范式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但又处在动态演变与发展之中，不断地推动着整体结构由量变向质变发

① 即“四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和“金华学派”。

② 黄宗羲：《万充宗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③ 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